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

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

市民群众参观“血肉筑就抗战生命线——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档案文献图片展”。 本报记者 高昊双 摄

80年前，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，最终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，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云南人民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，云南人民团结奋斗，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书写了光辉篇章。

凝聚抗日救亡磅礴伟力

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杰出组织者、鼓舞者和实践者。通过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党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，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。

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。在中共云南组织的领导下，云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、民众歌咏团、学生爱国运动会、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等众多救亡团体相继成立。七七事变后，云南党组织专门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，领导青年抗日救亡工作，成立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，发展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”。同时，党在西南联大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、群社，在云南大学建立时事研究会，在职业青年中成立昆明业余联谊社等组织。这些团体在党的指导下，深入城乡、工厂、军营，通过印发刊物、组织歌咏戏剧演出、街头讲演、游行等方式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发动大规模学生和群众救亡运动，极大地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

中共中央、南方局及云南党组织通过持续、多层次的统战工作，成功争取和团结了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，建立并巩固了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37年8月，朱德、叶剑英在南京向龙云阐述中共团结抗日方针，龙云表示赞同并要求与延安建立电讯联系。1938年8月，朱德致信龙云，勉励其继续“发动民众，巩固其爱国热诚，发挥其救亡伟力，同心协力，缔创独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国”，此信刊载后影响深远。此外，朱德、吴玉章以师生故友身份致信李根源，呼吁其发动军民抗日。李根源积极响应，凭借其影响力在云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、周素园，以及李群杰、刘惠之、欧根、朱家璧、张子斋、冯素陶、楚图南等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，也为推动滇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、团结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中国共产党团结文化界爱国人士，组成“文化军队”，坚持文化抗战，引领发展先进文化。聂耳谱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吹响反抗侵略号角；桂涛声作词《在太行山上》传遍大后方和根据地；艾思奇撰写《大众哲学》指引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在党的文化抗战思想指导下，云南形成了党领导的文化骨干与广大文化人士并肩作战的格局，营造了以爱国、民主、进步为主流的文化氛围。服务抗战的报刊、书籍、广播、出版及文化团体蓬勃发展。抗战时期，众多高校、研究机构和文化团体迁滇，众多教育精英、知识分子汇聚昆明，使昆明成为西南文化重镇。其中，西南联大继承五四、一二·九运动传统，秉持“刚毅坚卓”校训，践行文化统一战线，以“教育救国”担起抗战责任，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。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为巩固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，中共南方局和云南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方针，发起“讨汪”运动，声讨汪精卫投敌罪行，坚定了地方实力派的抗战决心；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；继续争取龙云等地方当局，维护团结抗战局面，支援全国抗战直至胜利。抗战后期，昆明成为国统区坚持民主、团结、抗日的“民主堡垒”。

市民群众参观“血肉筑就抗战生命线——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档案文献图片展”。 本报记者 高昊双 摄

奏响抗击侵略英雄凯歌

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中国共产党率先擎起武装抗日大旗。无数云岭英雄儿女奔赴疆场，周保中在东北率领抗联浴血苦战；王复生潜伏敌报《黑龙江民报》搜集日伪情报；王有德在一二·八淞沪抗战中舍生忘死；周建屏在平型关大捷后，转战太行开辟敌后根据地；罗炳辉独创“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”抗击淮南日寇，罗占云与之并肩杀敌。

全民族抗战初期，云南作为战略后方，“输送二十万军队于前线，输助物资，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”。滇军主力陆续组成第60军、第58军、新编第3军等部队，奔赴华东、华中战场，以滇军为基干的老3军开赴华北战场。中共云南组织发动群众全力支持，广大妇女日夜赶制寒衣、鞋袜，战地服务团随军救护宣传。在184师师长张冲的支持下，中共党员张永和与延安、武汉党组织派来的周时英、杨华、张天虚、薛子正等同志建立秘密党支部，组织政工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鼓舞滇军士气。

滇军将士浴血奋战，气壮山河。在徐州会战中，第60军驰援鲁南，死守台儿庄防线近一月，伤亡过半仍重创日军，赢得“国之劲旅”称号，成功掩护数十万友军转移。1940年该军回防滇南，后相继整编，沿中越边境构筑坚固防线，使日军在近5年时间里未敢越线，胜利后赴河内受降。第58军、新3军在湘鄂赣前线抗击日军近8年，参与南昌、九江受降；老3军长期坚守中条山歼敌无数。全民族抗战八年，滇军出师42万，伤亡逾10万，唐淮源、王甲本、寸性奇、陈钟书、严家训等爱国将领壮烈殉国，没有一个将士投降变节，表现出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云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中国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。中国政府毅然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与盟军协同作战。1942年，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，转战1500余公里，取得了东吁保卫战、斯瓦阻击战、仁安羌解围战、东枝收复战等胜利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自缅北侵入怒江以西，云南由后方变为前线。中国远征军依托怒江天险，挫败日军东进，坚守住了西南大门。中共云南组织及在滇军中的党员，遵照南方局的指示，积极准备敌后游击战。李根源《告滇西父老书》、张问德《答田岛书》极大地鼓舞了滇西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。滇西、滇西南各族民众组建龙潞抗日游击队、佤山人民自卫总队、滇西边区自卫军等10余支武装，在极端困难中袭扰牵制日军，有力支援远征军反攻。

1943年12月至1945年3月，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发动缅北、滇西大反攻。驻印军于1943年10月起经苦战，于1944年8月攻克密支那；滇西远征军于1944年5月在盟军及各族民众支援下强渡怒江，血战收复腾冲、龙陵、芒市，最终与驻印军芒友会师。此役彻底歼灭滇西日军，较早将侵略者赶出国门，策应了盟军印缅及太平洋战场。

弘扬共赴国难爱国情怀

云南在抗战中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，“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”，其各族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之一。1937年底起，沿线滇西各族群众自备粮服工具，日夜奋战。他们以简陋工具，仅用9个月便打通了这条“国际大动脉”，创造了“惊世奇迹”。无数公路员工和民工顶着日军轰炸，冒死抢修，竭力保障畅通。为抢运援华物资，在陈嘉庚号召下，3192名南洋优秀司机与修车师傅组成南侨机工队（即南桥机工回国服务团）归国。他们与国内机工一道，不畏艰险，在滇缅公路上源源不断输送物资，千余名华侨机工牺牲于此，被誉为“神行太保”。爱国侨领梁金山亦率车队加入抢运，并动员旅缅华侨输财助战，倾注爱国热血。

中印公路（曾命名为“史迪威公路”）自印度雷多至中国昆明，全长1730公里。1942年12月至1945年1月，在中美工兵及滇西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建成，粉碎了日军封锁，恢复了同盟国与中国陆上交通，有力支援了反攻作战。同时，为缓解中国战区严重缺油的问题，中美沿中印公路铺设了当时世界最长的输油管道。1945年5月，油管铺至昆明，至抗战胜利，输入油料逾20万吨。

1942年四五月间，为突破日军封锁，中美开辟驼峰航线。在这条被称为“通向地狱之路”的航线上，飞虎队不计代价的飞行，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中国人民倾力支持飞虎队。1941年，云南10万百姓不顾日机轰炸，用原始工具将昆明巫家坝机场扩大数倍。抗战期间，云南共出动民工超150万人次，新建、扩建数十个机场。机场被炸，民工就连夜修复。在中共党员郭佩珊的带领下，飞机修理厂的技术人员精心维修保养战机。云南各族群众还积极救援失散盟军人员，至诚支援并肩作战的英美盟友。

抗战时期，涌入云南的军民超百万人。云南山多田少，粮食本难自给，但云南人民节衣缩食，1944年仅稻谷即征购360万石。1937年全省认购救国公债500万元。1941年捐献飞机30架，居全国之首。抗战期间，云南每年举办“七七”献金活动，各界踊跃捐献。

日本侵略者给云南造成深重灾难。日军大规模轰炸重要城市及交通线，在滇西沦陷区烧杀抢掠，实施细菌战，导致霍乱、鼠疫大规模暴发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日军在云南造成军民伤亡超48万人，财产损失达25亿余元（1937年法币）。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以残酷手段摧毁云南人民意志。然而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，云南人民万众一心，与全国同胞共同筑起血肉长城，直至迎来伟大胜利。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，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80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前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，在云南深入实施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、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，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就是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牢记嘱托，感恩奋进，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，敢于斗争，善于创造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。 （执笔：张李明）

学者、战士、真诚的人：艾思奇与抗日战争

郭矩铭 邓静

艾思奇（1910—1966），原名李生萱。云南腾冲人。“艾思奇”一名源于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，即热爱卡尔·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。毛泽东评价他是“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艾思奇以笔为枪，战斗在党的理论战线前沿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4年至1935年间，艾思奇在上海出版的《读书杂志》上连载《哲学讲话》，1936年结集出版为单行本，一时洛阳纸贵，并在第四版时改名为《大众哲学》。该书以日常生活为例，语言通俗易懂、形式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。《大众哲学》让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，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。在那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年代，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通过该书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并奔向革命道路。蒋介石曾感叹道：“一本《大众哲学》，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！”由此可见，《大众哲学》对当时社会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同年10月，艾思奇奉中共中央之命奔赴延安。毛泽东在欢迎会上指出：“革命要靠枪杆子，也要靠笔杆子。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，有文有武，文武结合，革命的事业就能胜利。”自此，艾思奇的哲学运思进入与抗战实践深度结合的新阶段。

在延安期间，艾思奇积极投身于干部哲学教育体系的建设。1938年，在毛泽东的倡导下，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，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。1939年，毛泽东组织了六人的哲学小组，艾思奇是成员之一。无论是学会工作，还是小组活动，毛泽东作为成员经常参加讨论，研究问题。在此学风的带动下，延安的中央各机关纷纷成立学习小组。为满足学习需要，艾思奇编辑了《哲学选辑》一书，并撰写《哲学“研究提纲”》作为附录。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作了不少批注，提出许多深刻的意见。1942年，整风运动开始后，毛泽东提出编订一本收录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论述的书籍，以辅助整风运动的开展。不久后，艾思奇作为主要参与者，编成《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》一书。这本书被列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之一。

艾思奇还是文化战线上的关键力量。1940年，艾思奇担任主编的《中国文化》在延安创刊。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。在创刊号上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论著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此外，艾思奇陆续发表《抗战文艺的动向》《论中国的特殊性》《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》《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》等文章，阐述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方向、形式、重点和难点。如《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》一文指出，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，要团结全国力量，要反对错误思想，要深入广大群众，最终“建筑起全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”。

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、现实化，是艾思奇在抗战期间的一个重要转进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：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……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。”同年，艾思奇积极响应号召，发表《哲学的现状和任务》一文，并指出：“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、现实化的运动。”在他看来，过去的哲学只做了通俗化的运动，虽然初步推动了中国化、现实化，但二者仍有本质区别，因此文化运动尚未完全适应“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”。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法是：“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，发展哲学的理论。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，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。”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，艾思奇的哲学思考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，也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抗战实践的成果之一。

理论建设是正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驳斥谬误则是正本清源。艾思奇在抗战期间有两篇代表性的文章，详细剖析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几种谬误。一篇是1941年的《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》，另一篇是1943年的《〈中国之命运〉——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》。概言之：针对叶青的伪辩证法，艾思奇延续抗战前的批判，批评其是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唯心论，并特别驳斥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害；针对阎锡山的“中的哲学”，艾思奇辨析其主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哲学基础，进而揭示其维护地方军阀统治的实质；针对陈立夫的“唯生论”和蒋介石的“力行哲学”，艾思奇揭露其是“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”，直指这种哲学服务于“愚民政策”的政治本质。艾思奇的哲学批判，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，也在思想阵地上肃清种种错误思想，确保辩证法唯物论作为“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”，能切实应用于中国人民的战斗之中。

正如毛泽东的评价，艾思奇是一位“学者、战士、真诚的人”。艾思奇曾言：“我写《大众哲学》，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，而是为贫穷的百姓提供一个烧饼。”从撰写《大众哲学》到延安时期的工作，艾思奇始终心系百姓，把哲学思辨与民族前途相结合，把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相联系，在“哲学现实化”与“现实哲学化”的双向探索中，既让哲学深入抗战实践，又从抗战实践中升华哲学智慧，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。

2020年春节前夕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，看展品，听介绍，详细了解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、中国化作出的积极贡献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。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，不能照本宣科、寻章摘句，要大众化、通俗化。”当今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我们亟须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深、讲透、讲活的人才。这要求我们做到两个“化”字：一是中国化，理论阐释要紧扣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、人民生活的现实关切；二是大众化，告别“本本主义”，善于用生动语言、鲜活案例阐释理论精髓，让党的创新理论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重思艾思奇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，既是缅怀中华民族那段艰苦战斗的峥嵘岁月，也是鉴往知来，启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、大众化，以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。

（作者1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，作者2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和顺艾思奇故居。 本报记者 杨峥 摄

《陶述曾日记·耿马之行（1942）》：

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历史记录

邵彦涛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陶述曾日记·耿马之行（1942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耿马之行》），就真实记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团结一致、抵御外侮的历史。

陶述曾（1896—1993年），字翼圣，湖北黄冈（今属武汉市新洲区）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交通厅厅长、水利厅厅长等职，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，在水利工程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抗战时期，为打通国际交通线，他参与组织抢修滇缅公路、中印公路。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南部战事不利后，他又奉命破坏之前修筑的公路。《耿马之行》是陶述曾在耿马实施“破路”并借机开展对滇甸边境各土司、各民族的联络工作的日记汇编。从“修路”到“破路”，《耿马之行》记录下的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真实写照；从尊奉“老爹”到效忠“祖国”，流露出真切的命运共同体意识。

从“修路”到“破路”，一切都服务于团结抗战的总目标

1939年，陶述曾奉命参与修筑滇缅公路，修建从昆明至腊戍的简易公路。珍珠港事件后，日本大举进军东南亚各国，1942年春，日军攻占仰光并继续向北推进。当日军占领中缅边境城市密支那和腾冲时，陶述曾正在孟拱查勘并部署中印公路施工，其工程队被隔离在缅甸。经过20多天的艰难徒步，陶述曾率领技术人员绕过敌人防线回到祥云。《耿马之行》开始于1942年6月1日，即陶述曾回到祥云的第三天。

历史总是令人唏嘘。为防止日军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攻抗战大后方，蒋介石亲自部署了滇西破路工程。该工程不出意外地又落在了“修路”的陶述曾身上。陶述曾不无悲怆地写下：“我是冒着蛮烟瘴雨去到敌前，亲手毁坏我自己曾费心血筑成的路。”“修路”也好，“破路”也罢，陶述曾之所以没有退却，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服务于团结抗战的总目标。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附带任务，就是“下一点功夫联络各土司，使他们对于中央效命”。

事实上，两项任务是并线进行的。“修路”与“破路”，都不是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就可以完成的任务，而是需要紧密团结当地土司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。只有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对各民族关系的挑拨，动员各民族群众主动、自觉地承担起责任，树立起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理念，方能在精诚合作中共同完成这一任务。

联络土司齐心抗战，见证西南少数民族的爱国之心

陶述曾在接到“联络各土司”这一附带任务后，并不觉得为难，反而“颇感兴趣”。他认为，缅境的土司，“他们的祖先都是中国人，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把他们看外。我相信他们希望中国好起来的心理也和一般海外华侨差不多，联络他们是很容易的。”在日寇的淫威下，后方盛传滇西土司叛变投敌。陶述曾预判此非事实。他认为，若把滇西土司都视为反叛者、列入对立面，无疑会削弱抗战力量，使日本侵略者获益。即便个别土司投敌，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。事实正是如此，土司罕裕卿被诬陷为投敌，他一见到陶述曾就高兴地说：“我的冤屈可以洗清了。”之后，罕裕卿积极支持抗战并帮助陶述曾联络滇西土司。

1942年7月7日，陶述曾在耿马城组织召开了七七抗战纪念会。参会的有耿马土司罕富廷、孟定土司罕万贤、班洪王代表罕华文、猛角董土司代表罕富寿、缅甸果敢世袭县长杨文炳的代表等，“代表的民族却有汉族、回族、旱摆夷、水摆夷、倮倮、倮黑、卡瓦、老康、黎索、濮蛮、邦隆、山头、缅甸等十几族。”会后，陶述曾委派曾功武、陈毓汉等向各土司传达会议精神。

果敢麻栗坝土司杨虎臣、猛董土司罕华相接信后，都立即召集地方头人开会，“均热烈拥护七七在耿决议办法”，“表示拥护祖国的决心和归还祖国的愿望”。班洪王胡忠华先是不肯接见曾功武，还将其软禁，后通过其爱妾通译，详释抗战之意义，“忠华感动……召所属十七王行谒见钦差礼，并请代撰电文呈委座，报告拥护中央之决心。”邦隆已投敌并悬敌国旗，但其行政长官马美廷仍派使欢迎陈毓汉一行，并表示：“美廷未尝一日忘祖国。今强敌压境，而国军远在五百里外，不得不与敌貌为妥协……此种苦衷能见谅于祖国云云。”滇缅定界后，永邦卡瓦族土邦划归缅甸。但是卡瓦族土司麻哈“指天誓曰愿效忠祖国”，并拟函给缅境萨尔温江东岸各处酋长，“约一致拥护祖国抗战到底”。

《耿马之行》记事虽仅三个月，文字不过数万，却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少数民族群众齐心抗战的真实写照，无处不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感共鸣的时空，它以抗战历史凝聚着集体记忆，以家族情谊维系着情感回归，搭建起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框架。

[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，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史经验研究”（21BDJ105）的阶段性成果]